

文学伦理学视野下《黄金洞》的文本解读

张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中篇小说《黄金洞》一直赓续阎连科所构建的“耙耷世界”文学场域的书写,文本中桃与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意在表征现代化进程之中文学之于伦理道德理性书写的“异变”和反思。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作为引子来介入文本的分析,分别从伦理环境、身份选择和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三个方面加以阐释,来表达阎连科笔下耙耷世界的“乡村死亡报告”。

关键词:黄金洞;伦理境遇;身份选择;斯芬克斯因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1-0067-04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重要的乡土作家,他所构建的“耙耷世界”文学场域的书写是基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乡村—城市”相互交织、渗透、弥撒和反思的结果。这与作者拥有农村和城市双重身份标识有很大的相关性。中国现当代的乡土作家们大概都有此双重乃至多重身份的烙印并且基于此来构建自己文学创作的场域:鲁迅先生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山东高密地”、苏童的“香椿树街”等诸多乡土作家的文本书写中都或多或少地烙下了这两种空间交织在一起的文学场域的书写。阎连科是大器晚成的当代作家,也被业内人士评为“荒诞现实主义”写作的大师。诚然,其多数作品有着极强的隐喻性和反讽的特性,但对于经历过1980年代先锋写作浸染的作家,在强调“有意味的形式”书写的背后也定然有着属于作家自己的创作姿态和自我意识。而这创作姿态和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对于社会和自我内心叩问的伦理观的表达。

一、《黄金洞》建构的伦理环境

国内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范式的提出者和倡导者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中重视了作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其间可以就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方面我

们对作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有一定的感知和了解,如作家的生活环境、所处的文学地理环境、家学渊源以及求学道路等影响着作家自身伦理道德建构的因素,另一方面就是作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作品中所生发出来的伦理观的关系。当代叙事学的发展提出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相互交织和“较量”的复杂的关系。^[1]作家本人与“隐含作者”关系的明晰也是解读作家思想和作品中所要阐发的道德伦理观念之间“偏离感”的重要方式。作品中所呈现的道德伦理倾向有几分是契合了作家本人所常持的伦理观念以及其所产生偏差感缘由的解读也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部分。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作家所持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如作家在作品中关于道德的描述,作家对其描写的各种社会事件及其塑造的人物的道德评价等。^[1]由此可见,我们之于伦理境遇的阐释不仅仅就文本中所显现的文本环境来进行分析,更多的之于作家的生平经历、童年的个人记忆、以及作家所倾向的道德伦理观也应给予关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质素左右着作家进行创作和支配着文本之中伦理生存环境的建设。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阎连科小说世界中所建构的“乡村—城市”这两个场域做出相应的阐释和总结。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

收稿日期:2020-10-29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W024)。

作者简介:张琳(1981—),女,四川南充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思想与实事求是”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在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渐渐取代了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政治生态。随后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的确立也使得乡村和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作为文学创作者如何表达这种巨变,如何阐发城市与乡村两个文学发生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在“经济先行”号召下金钱的获取和消费如何异化人成了当时作家们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作为一个对现实社会注入颇多感情的当代作家,阎连科早年间的农村生活经历给予了他创作的养料,耙耧山区文学世界的建构也显得自然而深切。这里有着阎连科早期童年创伤记忆,也有着进入城市后自卑感、厌倦感以及乡村与城市相互交织渗透和因力量不对等所产生诸多悲剧性事件的痛感。城市、权力和生命是阎连科儿童时代的渴望。他所言道的生命应该是异于周遭村民且具有“他者”质素的城里人。他对于城市和城里人最初的印象是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一个女同桌的到来。来自当时洛阳城的小女孩,其父母被调到当地村街的一个商品批发部门里工作。女孩和村里人不一样的着装,再加之不一样的言谈和得体的行为举止,都给童年时代的阎连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下乡知青的到来,又强化了阎连科的这种认知。^[2]城里人作为一个介入者给予了作者对于城市之美好的想象和之于乡村落后贫瘠的巨大心理落差感,城乡差距之大也使得作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有了隐含在内心的自卑感和恨意。这种交织着钦羡、恨意和自卑感的心态也是作者以后之于城乡书写的主要感情调性。

阎连科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对于城市的书写脉络经历了从向往城市生活—暴露城市—欲望城市的三个阶段。那么之于另一个文学场域乡村的书写对于阎连科来说注入了更多复杂的情感。耙耧山谷的自然场景往往是偏平和静美的,但此间,之于生活中在这自然风物之下的乡村社会则是一个苦难史的书写:贫苦、疾病、权力的压迫。这和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般的乡村书写不一样,也迥异于鲁迅对于乡村“萧索”生态文学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望书写,阎连科更多的是把农村生活的藏污纳垢展现给读者。阎连科对于城市和乡村的书写都有着紧张和阵痛感,这是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在作品中的投射。早期农村贫瘠的生活经验和进入城市后靠写作而引发种种争议的不

适感都或多或少的和文学形成了互文的印证。

《黄金洞》的书写可以说是阎连科之于耙耧山谷文学世界中关于城乡书写的第三个阶段。就《黄金洞》中“我”之于贡家及其周边的讲述,村里已然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而做起了淘金的行当。在文本之中,贡贵是嫖夫,但贡贵是这个村里依靠技术而活的人,他具有可以找到金线走势的特殊技能。其间,与贡贵同居的城市中年女子秀兰和年轻的桃都是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从中获取利益的。先后为贡贵提供性服务的秀兰和桃均是来自城里的女子,尤其是桃,抛弃了已经在城里组建好的家庭而委身贡贵,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金沙和黄金洞的开采权。而作为嫖夫的贡贵也满足了自己性欲和占有城市女子的优越感。此间,农村与城市的书写关系也随着作家认知的深刻相应地发生了改变。烙印在农村这一身份的小说人物已不再是早期阶段对于城市的仰慕者、破坏者和担任“多余人”角色的扮演者。在这里,乡村与城市相互利用并且各取所需。表面上平衡状态的维系也存在着不对等,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传统理性伦理观念的渐进松动乃至瓦解、金钱浸淫下粗鄙生活方式的显露也给予了城市以“原罪”和乡村在这一平衡状态下所付出的代价。

二、被选择下的选择:理性的消弭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道:疾病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阴暗面,是一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的表征。每一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3]苏珊所指出的疾病不仅仅是指生物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身体部位所发生的病变和损伤,更深的层次是心理疾病的指向性。有关于疾病的书写历来是文学创作中正在进行的且连绵不断的重要表征之一。《黄金洞》中贡贵的第二个儿子二憨就是作家所塑造的病人,同时也赋予了他鲜活的形象和更深的异质性。

《黄金洞》的开头就以戏谑的语言作为文本的开头:世界像粪。我用力想呀想呀才想起原来像是粪。^[4]文本的开头给足了读者荒诞之感。这是贡家的二子二憨以一个病理学意义上的傻子视角来看他所体察到的世界:年长的父亲像猪一样在和来自城市的年轻女子桃交媾的情景。紧接

着,以第一人称的“我”(也即二憨)来讲诉贡家的故事。作为现代语境中第一人称的叙事就具有了伦理境遇和意义。它不像传统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全能上帝视角来俯瞰着文本人物的来往去就,人物不过是叙述者摆弄的棋子,并且没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我”的讲述和作者虽不具有同一性,但二憨作为“不可靠叙述者”也相对隐含作者的“代理”和“中介”性质。也即,作者用一个在病理上有精神疾病且被常人所忽略的病人来表达贡家因淘金沙而引发的乱伦之事就具有了迥异于正常逻辑的可靠性,使得二憨(也即文本之中的“我”)的表达不具有形式逻辑上的严谨性。然而吊诡的是,二憨对于桃的迷恋以及对待贡贵和他大哥的态度却是处于人作为生理上的自然属性的流露和某种程度上德性的展现。相比于被金沙所带来的金钱欲望驱使下的贡贵、贡老大和桃的相互利用和算计而言,二憨是具有人的主体性而非完全被异化的且被常人所忽略、排斥乃至调侃的具有生理疾病的人。

在《黄金洞》的文本之中,二憨作为一个傻子的存在也必然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属于自己的一套认知自然和人的行为逻辑。比如,在贡老大忌惮桃把贡家家业卷走时就怂恿二憨去打桃并且把她赶走。二憨就有了这样的逻辑推演:“老大说揍她这个狐狸,你是憨子,见了她就打,不愁她不离开咱爹,不离开村落。怎能打桃。桃的裙子那么红艳,大腿那么白嫩,又是城里的女人,早上晚上都把牙刷得白白甜甜,走过去一阵清凉,我当然不能揍桃。我说怪桃呀?怪爹,打桃一顿还不如把爹按在床上揍了。”^{[4]106}对于一个智力低下和在常人看来只是贡家生产工具的二憨来说,他也有自己对于社会 and 人的价值判断:相比于年迈衰老的贡贵而言,桃是年轻且具有生命力的,这对于不谙社会常伦的二憨来说这种选择是人的自然属性的流露。但,相比于桃与贡贵和贡老大三者因为金沙的利益相互算计而言却显得可爱而难能可贵。桃得知此事后给予了二憨以言语的规劝:桃把她额前的头发撩了,说:二憨,你爹六十多了,我从省会丢掉我的孩子来侍奉你爹,你家沙洞里淘出的金子,都是我帮着卖了出去,卖了全村最高的价钱,为了你们贡家,我回去我男人打我,女儿不跟我说话,你们贡家富了,钱堆着像一堆树叶,可你爹从来没舍得白给我一张,就这你还来打我?在这儿等我一夜打我不是?桃看着我,在越显明

亮的清早里,目光汪汪就像两池清水。^{[4]211}这里的叙述不仅仅交代了桃的身世背景,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和二憨达成同盟一致对抗贡老大,通过夸大的语词来描述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言语之间桃的精明和狡黠立现出来。在随后的桃与贡贵和贡老大的利益纠缠中,桃也利用了二憨对自己身体的迷恋一步步诱导二憨来帮助自己。

二憨在文本之中也有着相应的对抗心理,并且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度。制造状况且坍塌的意外事件帮助桃除掉贡老大,桃许诺给他找一个像桃一样的城里媳妇未兑现时而产生抵触心理都是二憨在恪守属于自己的一套“诚信契约”的价值理念。最终,随着贡贵的死去,二憨也得到了桃的身体。但这种得到是桃主动送过来的,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得到金矿的开采权而主动和二憨发生关系的。二憨的选择在常人看来是动物的自然属性的展示,相比于桃和贡贵及贡老大因为金洞的开采权的争夺而相互算计乃至走向残杀的非理性境地而言,其善恶的判断并没有因此消弭殆尽。因为其智力的缺陷和家人的瞒骗,才使得他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来得到桃。这种被选择下的选择,作者也赋予了二憨以同情态度。此间,理性的人伦已悄然耗尽。

三、失控的斯芬克斯因子:该往哪里走?

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一文中提出并且阐释了斯芬克斯因子这一概念。人的演化是以脱离纯然的动物本性而成的,但动物性的质素在个体的基因中也没有消弭掉,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的某些行为,它非理性并且不受理智思维所约束。这相比于佛洛伊德关于“力比多”的阐释也有所不用,此间的非理性更趋向于更原始的兽性。我们可以把这一特点称为斯芬克斯因子。^[5]人性因素和兽性因素是构成斯芬克斯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人性因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质素所在,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活体的重要指标,是高级因子并且包孕理性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是兽性因素,它是在演化的过程中仍然保存在基因体内的动物性,是低级因子且具有非理性质素。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6]27}放置于个体,“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往往是以相互交织、冲突和此消彼长的运动态势来展开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的理性意

志和自由意志的交锋与转换,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怎样抑制和引导自由意志,让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6]⁶⁵

然而在《黄金洞》的文本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失控,也即人的兽性因子的无限放大而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金沙的发现和金矿的开采为当地人带来丰厚回报的时候,传统农耕文明孕育下的社会伦理也面临着瓦解。金沙回报给当地人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改善,同时也打开了压抑在人内心的兽性的萌发。兽性在此文本中不仅仅是广义上的动物性和生物性,更多的是关于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所遭遇的后果,也即现代性的后果。也即,现代化的发展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带给了人欲望的勃发。它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立人思想的阐发,也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讨论。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启蒙的有限性和挫败感使得作者在书写《黄金洞》的时候陷入了“无主之阵地”。在这里,由于传统伦理的规范性在失效,人的欲望得到了极限的展露,桃与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也没有在作者的笔下得到惩罚,以达到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相持平衡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4,169.
- [2] 阎连科. 我的那年代[M]//北岛,李陀. 七十年代.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7.
- [3] [美]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1.
- [4] 阎连科. 中篇四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5]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 [6] 辛绍军. 谈人性与兽性[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0.
-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7.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Golden 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ZHANG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la "Golden Hole" has continued to write about the literary field of "Rake Columbine World" constructed by Yan Lianke. In the text, the incest between Tao and Gong family father and son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literature. "Alter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ethics and rational writ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he critical methods of literary ethics as a prelude to interven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It interprets the ethical ethical environment, the choice of identity, and the sphinx factor that is out of control, respectively, to express Yan Lianke's tracing of the world "Rural Death Report".

Keywords: Golden Hole; ethical circumstances; identity choice; sphinx factor

(责任编辑:李 军)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范式中,文学的基本功能大抵是对于人的教诲功能。文学的最终诉求不在于为人类提供消遣和排解寂寞,而是在为人们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7] 阎连科是关注现实生活书写的当代作家,他所构建的耙耧山谷文学世界也一直立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交织、勾连和紧张的关系中展开的。《黄金洞》中关于桃和贡家父子三人的乱伦之事也意在表征着现代化进程之中乡村传统伦理的解构和“异变”。文本的最后,作者也没有对小说人物的伦理选择给予评判,只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对于乡村一城市的生命体验通过文本的书写展现给读者。这样的表达也是受到新写实主义的影响,是对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书写的摒弃,尽力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在作品中变相地表达生活的“纯态事实”。当然,作家无论是有意地回避还是无意地流露,《黄金洞》的书写可以说是一部“乡村死亡报告”。其间也暗含着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传统理性伦理的召唤。